論　著

兩個祖國的邊緣人：「遺華日僑」的戰爭、記憶與性別*

林　志　宏**

摘　要

所謂「遺華日僑」係指二次大戰後因各種因素被遺留在中國的日本僑民，其中又以留在東北地區者最多。在國共內戰時期，他們歷經了生死關頭，改變身分而成為中國人；直到 1970 年代日本與中共恢復外交之際，這群人才恢復身分返回日本，成為「兩個祖國」的邊緣人。本文從

* 本文為求簡化書寫，凡具有爭議性的字眼，如世所共知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深富政治性意義的「滿洲」、地域分布的「北滿」及「南滿」等，一概省略引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 24 期（2014 年 12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戰爭、記憶與性別等角度探索「遺華日僑」的身分認同。在第一部分，筆者嘗試釐清戰爭記憶本身的意義。簡言之，「遺華日僑」不僅是冷戰時期兩國外交「戰爭」下的棋子，而且他們的「滿洲經驗」也變成追索戰爭責任的場域。第二部分是分析這些「記憶」的各種體驗，包括他們身為社會底層的無奈，還有戰爭結束之際生離死別的過程，乃至有關恐懼的「滿洲經驗」。最後，對於未來的選擇上，性別差異也是造成他們做出不同決定的重要因素。無論如何，身為邊緣人的「遺華日僑」，無疑是戰爭悲劇下特定時空的產物，具有複雜的身分認同。

關鍵詞：「遺華日僑」、滿洲記憶、遣返、口述史、身分認同

前　言

1995 年 11 月 11 日，日本NHK電視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台合作，將女作家山崎豐子(1924-2013)原作《大地之子》改編成連續劇。[1] 全劇描述中日戰爭至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名在中國的日本遺孤松本勝南之經歷。戲中起自二次大戰失敗後，日軍、日僑紛紛撤出中國東北地區（以下為

[1] 該部戲本來是為了紀念 NHK 電視台創台七十週年而作，最先是以 7 集（1995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23 日）的形式播出，後來廣獲社會好評，於是電視台將原來省略的 40 分鐘加入，分為 11 集（1996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0 日）重新播出。相關報導見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B0%E3%81%AE%E5%AD%90（2014 年 3 月 28 日檢索）。

了配合原來史料的運用，稱作「滿洲」），少年松本與家人離散，被善心的中國人扶養，進而展開一段傳奇人生。故事講到文化大革命前後，擁有日人身分的松本不但失去愛情，接著還遭陷害，歷經下放勞改，死而復生，最後尋獲其親妹，並與生父相認。這部以口述文獻為基礎，結合親情、愛情的戲劇，後來贏得蒙地卡羅國際電視節(the Monte-Carlo TV Festival)最佳作品獎(the Gold Nymph Award)，也在日本社會造成轟動，引發討論。[2] 虛構劇情引人入勝，帶來熱烈迴響，正因有其社會基礎之故。由於和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它勾起人們聯想到一群身處社會邊緣的族群—「遺華日僑」(係「中國殘留婦人」、「中國殘留孤兒」、「中國殘留邦人」、「遣返日僑」、「日本遺孤」等名詞的統稱）存在於兩國之中。

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歷經長達 40 年的經營，有意將滿洲塑造成「新天地」；特別是 1932 年 3 月建立滿洲國後，更處心積慮地從國內移民。[3] 這批堪稱史上

---

2 〈NHK2 作品がグランプリに　モナコの国際テレビ番組コンクール〉，《朝日新聞》，1996 年 2 月 22 日，第 12 頁。山崎豐子日後也在自傳中談到得獎經過，參見山崎豐子著，王文萱譯，《作家的使命・我的戰後》（臺北：天下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87-188。至於討論部分，例如石濱昌宏、田所竹彥、景慧、伊藤一彥，〈ドラマ「大地の子」を檢証する〉，《宇都宮大學国際學部研究論集》，號 6（1998 年 6 月），頁 183-198。

3 Sandra Wilson, "The New Paradise: Japanese Emigration to Manchuria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7:2 (May 1995), pp. 249-286. 根據日本外務省調查，戰爭結束之際滯留海外的日僑共 660 萬人，其中在滿日人約 155 萬（包含住在關東州的有 25 萬）。原屬參與滿洲移民「開拓」工作的人，總共將近 27 萬名（其中包含徵召的 47,000 人）；後因各種因素而致死者，約 78,500 人（病

最多人數的計劃性移民，戰後卻遭到遣返命運，又在一連串不幸發生下「殘留」於中國境內。[4] 直到 1972 年 9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以下行文簡稱為「中、日兩國」）外交邁向「正常化」後，調查遺華日僑的動向成為首要目標。實際上，這群人回歸到現實社會裏，開始面臨各種抉擇，包括隨之而來的不平等待遇，還有如何面對、調適生活等心理狀況。他們的過去種種，非惟成為目前族群研究中的熱門焦點，[5] 也帶來社會議題與法律爭議。

從歷史角度來看，遺華日僑毋寧也是研究日本帝國時期、滿洲國乃至戰後中日交流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環。[6] 然而相較於社會學者，歷史學界處理遺華日僑的課題時，經常囿於各自立場，缺乏客觀分析。以中文書寫為例，對日本移民

死的有 66,980 人，自殺的有 11,520 人），占四分之一。至於戰後生存未歸者，則有 4,500 人。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會編，《滿洲開拓史》（東京：全國拓友協議會，1980），頁 507。

4 小島雄輔，〈中国殘留者發生の經緯と背景〉，《政治學研究論集》，號 21 (2004)，頁 273-293。

5 相關討論很多，茲不贅述。可參見井出孫六，《終わりなき旅：「中国殘留孤兒」の歷史と現在》（東京：岩波書店，1991）；蘭信三，《「滿洲移民」の歷史社會學》（京都：行路社，1994）；宮田幸枝，〈「中国殘留婦人」問題と教育實踐：識字實踐を中心に〉，《人文學報·教育學》，號 30（1995 年 3 月），頁 205-223；山田陽子，〈中国歸国子女と家族への日本語教育：1970 年代に開始した村〉，《人間文化研究》，號 9（2008 年 6 月），頁 141-153；張嵐，《「中国殘留孤兒」の社會學：日本と中国を生きる三世代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東京：青弓社，2011）等。

6 最具體的證例，就是最近出版的滿洲史辭典，也將山崎豐子書名《大地之子》一條列入其中。貴志俊彥、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〇世紀滿洲歷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頁 597-598。

滿洲之討論，帶有民族主義的情緒性字眼，依然無法擺脫「侵略」的敘事主軸。[7] 儘管今日研究風氣已能掌握、運用較多元的檔案資料，惟仍難克服意識形態及框架主導，[8] 鮮少以人性面客觀地理解其處境。至於日本學界，雖然關注滿洲移民的著作不少，其中不乏反省戰爭責任者，但由於見樹不見林，並無深化「人群移動」之對照及其思考。像是留意日本「內地」向滿洲移民之餘，有關其他地區（包括殖民地、占領地等）前往滿洲的群眾，[9] 當中所呈顯的社會、經濟等層面與意涵。

近年受到帝國主義與後殖民(post-colonial)研究啟發，戰後日本民眾的遣返與移動成為一項備受矚目之議題。例如，日本學界曾以集眾之力，分析「帝國」結束之際各項復員活

---

7 像是文革前的討論，即為具體實例。孔經緯，〈1931 至 1945 年間日本帝國主義移民我國東北的侵略活動〉，《歷史研究》，期 3 (1961)，頁 97-107。

8 伴隨 1970 年代中、日兩國外交的「正常化」，日僑遣返也成為中文研究的重點之一，如最近的專書討論有：關亞新、張志坤，《日本遺孤調查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張志坤、關亞新，《葫蘆島日僑遣返的調查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惟對日人移民方面，仍秉持所謂「侵略」的見解。至於臺灣情況較為不同，主要從臺灣史的角度探究日僑遣返，參見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期 3（2003 年 9 月），頁 201-227；吳文星，〈戰後初年在台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3（2005 年 6 月），頁 269-285。

9 以臺灣為例，從事醫療背景的許多人便前往滿洲，也有基於平等待遇或生存發展到新天地者。相關討論參見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卷 11 期 2（2004 年 12 月），頁 1-75；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3（2012 年 9 月），頁 95-150。

動，包括遺華日僑的組織、歸還遺骨工作，乃至國際冷戰局勢所扮演的角色。[10] 以英文著作來說，有華樂瑞(Lori Watt)和玉野井麻利子(Mariko Asano Tamanoi)兩位的重要研究。前者討論主要指出：日本帝國時期與戰後人群的移動，使得日僑業已成為一項複雜之歷史議題。它不僅如實地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擴張和瓦解的過程，也因戰後美國的「占領」及介入，加上遣返者作為「他者」而存在，結果使得日本促發了新的國家認同。[11] 至於後者，則釐清記憶作為「遣返話語」(repatriation discourse)代表的意義；當遺華日僑的回憶一旦納入歷史，記憶滿洲非惟指涉他們在中國東北的生活而已，它還觸及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大亞洲主義、後殖民性等多項課題，甚且是全球化地緣政治的想像及影響。[12]

實際上，處理遺華日僑的「滿洲經驗」，應當要留意遣返話語不是一整個無法移動的板塊，而是隨著時空的階段性差異，有其不同內容。[13] 尤其隨著年齡世代的變遷，回憶滿

---

10 增田弘編著，《大日本帝国の崩壞と引揚・復員》（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2）。

11 Lori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特別是第五章。

12 Mariko Asano Tamanoi, *Memory Maps: The State and Manchuria in Post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 3.

13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兩篇相關書評。參見 Mariko Asano Tamanoi, "Review: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by Lori Wat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9.4 (November 2010), p. 1257; 曾齡儀，〈評華樂瑞《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引揚與重整》〉，《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3（2012 年 9 月），頁 242。

洲具有複雜的情感糾葛，斷非三言兩語所可形容，也不是單向方式的呈現。誠如坂部晶子所言，殖民地記憶非僅只有支配者的體驗，還有來自抵抗者、被害者的印象交相互疊。換言之，那是一處各種形形色色聲音共同構築的場域，隨時因應不同的情況而有所變化。[14]

這篇短文之目的，並非要重新檢討那些「滿洲經驗」，而是希望思考目前討論遣返話語同時，通過遺華日僑的文字檢討幾項主題：戰爭、記憶與性別關係。此處所謂的「戰爭」，並非意指真正戰事進行之憶述，而是凸顯這些回憶的大量湧現，本身有其目的與意義，毋寧也是一場爭奪利益和非武器的戰爭。接下來的部分，則將釐清記憶的敘事主軸。筆者要談的是：這些回憶都有其共通點可循。首先，它們都是「弱者的聲音」。遺華日僑不管是身處日本或者中國東北，無論戰前還是戰後，都屬於生活在社會底層而被迫改變的一群。第二、憶述內容著墨最多之處，在於歷經生離死別的過程，還有強調恐懼、無奈等情緒；我們怎麼看待當中的意義？本文最後還要處理性別關係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性別成為記憶敘事的內容時，人們又是怎樣合理化自我行為，藉此表達自己的抉擇和行為。

---

14 坂部晶子分析戰後中、日兩國「正常化」外交，以會報上文章提醒讀者應該注意所謂「故鄉」形象的兩面性。當日本人回到滿洲舊地重遊時，他們心中有著一個已經消逝的過去，而看到現今中國東北，已經缺乏昔日追懷的鄉愁。即使是曾經殖民滿洲的日本人，同樣的地方卻有各自的想像。坂部晶子，《「滿洲」經驗の社會學：植民地の記憶のかたち》（京都：世界思想社，2008），頁 74-75。

一、利益與非武器的「戰爭」

探討這些回憶的內容本身之前，有必要稍加說明一下它們所產生的背景。眾所周知，歷數戰爭期間發生的慘狀，往往並非出自人們主觀上的意願，經常是在特定的時空環境裏進行。要不是基於某種因素、或被某些觀點限制所建構，人們在盡可能的條件下，不太會願意去回想自己悲痛、恐懼的過去。因此，掀開「滿洲經驗」的記憶有其特殊背景。由於日本敗戰、滿洲國覆滅之際，大量地檔案遭到秘密銷毀，再加上接著戰亂紛更，許多有關戰爭前後時期的情況難於獲悉。[15] 據此，親歷者所保存的遺物，乃至他們藉由回憶留下的任何文字，都顯得彌足珍貴。其中有關遺華日僑的事後追記，無疑補充了這些過往遺闕，為歷史保留了不為人知的吉光片羽。而掌握這些憶述資料的生產過程，將有助於我們更加理解其目的與內容上的歧異。

首先要知道，任何記憶或口述記錄下來的文字，經常屬於人們刻意的行為，處於一種「塑造自我」的過程。無論受訪者還是作者本身，追索過去發生的事情，難免會站在主觀立場，凸顯一己行為。有時環繞在其他利益或隱惡揚善等諸多理由考量下，使得敘事充滿自我主體性；是以考察這些內容的真確性與否，吾人不可據以為信，認為毫無可疑。而且，個人回憶之中會過度強調某些「事實」，所以我們應當警覺

15 相關討論見井村哲郎，〈滿鐵編纂史資料の現在〉，收入アジ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編，《史料　滿鐵と滿洲事變——山崎元幹文書》（東京：岩波書店，2011），上冊，頁 7-8。

是否有其「意識」存在。如 2001 年，鈴木則子等 3 名遺華日僑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以國家未實際保護公民而遭受精神損失為由，要求申請國家賠償 6,000 萬円（每人 2,000 萬円）。[16] 該件案例曾經轟傳一時，歷時五年之久，最後在 2006 年 2 月 15 日時由法官判決予以全部駁回。法官結果並無完全採信 3 名原告證詞，主要原因係由於涉及「利益」，並且攸關到國家整體問題。而法律層面沒有站在遺華日僑一方，或許與追憶內容能否視為證據不無關聯。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呈現記憶的方式因應不同之客觀條件而發展。即使戰後日人對「滿洲經驗」的描述文字，每個階段也各有其著重點，不可一概而論。譬如，戰後初期係來自帝國時期參與各殖民地區調查活動者的陳述；1960 年代之後，主要為滿洲國的政、財、官界相關知名人物，由他們各自來編寫回憶錄； 1970 年代起，伴隨個人生命史展開的各項回憶資料，更是著重於描寫私人領域的瑣事。等到 1980 年代以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揭櫫「戰後政治的總決算」原則，儘管造成輿論批判，卻帶動一波個人對「滿洲經驗」的描述。[17] 又以空間地域來說，殖民地民眾（如朝鮮、臺灣）的「滿洲經驗」也和帝國日本「內地」的人們接觸層面相異，理解上自然有別。另外，性別亦成為當中一項明顯地差異所在，因為就比例而言，女性泰半成為遺華日僑的主角。由不同的性別

---

16 全文參見 NPO 法人中国歸国者の會編，《中国殘留邦人等国家賠償求訴訟》（東京：編者印行，2006）。

17 小林英夫，《「滿洲」の歷史》（東京：講談社，2008），頁 267-275。

憶及滿洲種種，當然側重內容也有所不同（詳下）。

第三，後人體認任何與「滿洲經驗」相關的遣返話語與文字時，應該要思考到皮耶．諾拉(Pierre Nora)所言，這些記憶很可能都源自「一個社會有意識地生產」。[18] 諾拉所談都是以集體記憶或歷史建築物為主體，並沒有涉及口述方面資料的意涵。然而饒富興味地是，口述者或紀錄者往往透過記憶分享而重新「詮釋」，毋寧也可能受到社會整體「後見之明」所影響。最先開始記錄「滿洲經驗」者的生命歷程，約自 1950 年前後，而大規模展開則要到 1970 年代時期。[19] 隨著當時中、日兩國外交「和解」的前提下，儘管個別的遺華日僑有其不同遭遇，但他們卻集體共同完成「滿洲經驗」之憶述。加上因應現實政治的需要，雙方於是開啟調查日本遺孤的工作，從而累積了不少的口述紀錄。後來這些回憶逐漸化為文字，進而發展成為後人的研究基礎，乃至官方的歷史解釋。

最具體的實例，乃是中國透過輯錄編寫的各地《文史資料》。《文史資料》係國務院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下行文簡稱「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所倡議。1959 年 4 月 29 日，周氏希望透過訪查耆老，獲得舊中國時期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和知識，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之

18 皮耶・諾拉，〈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收入皮耶・諾拉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頁 27。

19 成田龍一，〈「引揚げ」に關する序章〉，《思想》，號 955（2003 年 11 月），頁 170。

後，從中央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政協相繼成立機構，開展徵集工作，最終以「內部資料」的形式出版。[20] 經由自己編寫、他人採錄或提供稿件等，各地出版的《文史資料》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龐大的「集體記憶」活動，據說文字已超過億萬之譜。然而，基於出發點殊異，不同語文所呈現的回憶當然強調內容亦有不同。[21] 以遺華日僑為例，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主要描述日人如何到滿洲來進行掠奪，說明其中不公不義的部分，然後戰爭結束時中國人又是如何撫育遺孤，表現出寬大胸懷之精神。反觀日文方面的回憶資料，則多傳達「開拓」精神，還有敗戰之際遺留下來的人面臨困境，以及最後歸返日本之過程。整體來說，這是一場自戰後通過記憶滿洲、以重新回歸歷史的「文字戰爭」，目的則是爭取外交談判的籌碼。在面對追究戰爭責任的討論裏，雙方「各取所需」，保留各自的目的和「教訓」。

因此，這些戰爭記憶之意象，無疑也是「發生中歷史」(History as it occurs)的一部分。以下除了零星的口述資料外，筆者將集中在兩份口述訪談上，分別是《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和《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共 5 冊），它們是一群參與農業開拓團的遺華日僑之紀錄。之所以選擇這兩種文本進行討論，主要基於如

---

[20]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文史精華》，期 2 (2009)，頁 13-21。

[21] 對於文史資料問題及其可徵信度，不妨參考：上田貴子，〈文史資料についての覺書〉，《近現代東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會ニューズレター》，號 12（2003 年 12 月），頁 14-17。

下幾項原因：第一、它們分別是中、日文不同語文撰寫有關「滿洲經驗」的作品，可以從中分析其敘事結構之異同。第二、這兩種口述訪談資料，儘管成書時間不同，可是所針對的主題卻是一致，觀照到性別角色與對象比例。第三、兩部書主要涉及的地域都在北滿，並都以日本開拓團為主。中文由黑龍江方面出版，自然以該省為主；而日文書中的「下伊那」在長野縣，亦是開拓團前往滿洲最多的地方。

二、記憶敘事的主旋律

攤開遣返話語中的各項描述，遺華日僑的記憶裏有幾條主旋律，分別書寫著他們來到滿洲「新天地」的景象。

（一）異地離別的前奏

第一條主旋律是關於他們參與帝國日本殖民史的開端，也是接觸另一個「祖國」──中國之起點。許多回憶裏都刻畫社會上經濟遭受戰爭而惡化，無論男女為了擺脫貧苦，紛紛參與開拓滿洲的行列。自從 1905 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帝國積極部署「大陸政策」，東北亞成為其經略地域。在關東軍高唱「日滿不可分的關係」下，兒玉源太郎(1898- 1906)、後藤新平(1857-1929)、福島安正(1852-1919)等人建議向外移民，於是滿洲、朝鮮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22] 這一移民政策

[22] 滿洲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滿洲國史・總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頁 632。

的推展，目標則是配合軍事活動，滿洲尤其成為「新天地」。儘管上述的考量一直都有人推動，但要到 1930 年代後期才轉為「國策」，[23] 執行所謂「20 年百萬戶移民計劃」。松田千衛、鈴木五三美等人便以政府宣傳滿洲「地大物博，土地肥沃，資源豐富」之下，為了解決生活壓力而步上「開拓」之途。[24]

儘管紓解了生活壓力，可是開拓工作並非一蹴可幾，毫無阻礙。遣返話語的第二條主旋律，便放在他們如何適應這塊嶄新的土地──滿洲，還有描述生活方面所發生的種種障礙。譬如，對農業耕作方面，由於滿洲與日本的氣候差異甚巨，前者不僅嚴峻許多，且變化極大。雖然有人曾考慮援用

23 考量移民包括幾項因素：（一）對蘇聯作戰的後備兵力；（二）維持和確立滿洲的治安對策；（三）解決過剩的農村人口；（四）強調日本帝國與「東亞共榮圈」的利益；（五）掠奪重工業的資源。1930 年代初期日本推動移民滿洲的政策，實際效果相當有限，早為有識之士所察。譬如矢內原忠雄以貨幣經濟原理認為：生活水平較高的日人難與中國東北當地農民從事競爭，另一位中國評論家橘樸同樣抱持類似意見。相關研究也指出，1930 年代初期日本向滿洲移民的成果應該相當有限。參見淺田喬二，〈滿洲農業移民政策の立案過程〉，收入滿洲移民史研究會編，《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滿洲移民》（東京：龍溪書舍，1976），頁 104。矢內原忠雄，《滿洲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34），頁 114-116；橘樸，〈時評・滿州移民の經濟價值〉，《滿州評論》，卷 6 號 23（1934 年 6 月），頁 4-6；Sandra Wils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33*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46-149.

24 松田千衛，〈惡夢醒來〉，收入政協黑龍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政協方正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頁 33；鈴木五三美，〈到中國家庭的前前後後〉，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25。

「北海道農法」來解決，[25] 惟仍難以克服；最後不得已則採取因地制宜的方法，僱用現地農民進行耕作。[26] 加上彼此之間缺乏信任感，日人並不認同中國人的農業粗放式耕作，結果情況是到處碰壁。[27] 此外，大陸型氣候的夏冬兩季分明，春秋兩季短暫，天候陡變令人健康倍受侵襲，且在衛生條件極差情形下，嬰幼兒易染病死亡。許多開拓團民精神屢遭打擊，易生思鄉情緒（日文譯為「屯墾病」）。[28] 疾病方面像是痢疾傳染，帶來極大威脅；當時的下水道處理並不健全，飲水習慣尚未改善，導致死亡甚多。[29] 根據闞島要三回憶：

---

25 「北海道農法」是 1938 年小森健治來滿洲考察後所提倡採用，主要是針對北滿氣候問題，認為在來農法的稻作事業並不適用，建議應該以同緯度北海道的農作方法來進行。參見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會編，《滿洲開拓史》，頁 419-420。

26 相關例證可參見中山房治，〈中国の養父母に育てられて〉，收入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2》（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6），頁 101。

27 1940 年代曾在滿洲開拓的北澤輝子便說：「日本人種旱田的方法是在平板地上種。號上僱傭的中國人非常善良，教給我們種地的方法，可日本人不相信，認為是騙他們，說中國的種地方法浪費地，仍然固執地按照自己的方法種，一壟雙株或多株，壟與壟之間的距離又很近。結果到秋天，玉米稈很細，玉米棒兒也不大點兒，有的還不結棒兒，總共也打不出多少糧食。……後來我們也種水田，當地的朝鮮族人教我們種田方法，由於是漫撒【種】籽，耕種方法不先進，所以收成也不太好。」北澤輝子，〈痛苦的回憶〉，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63。

28 今井良一，〈戰時下における「滿洲」分村開拓團の經營および生活實態——長野縣泰阜分村第八次大八浪開拓團を事例として〉，《村落社會研究》，卷 12 號 1（2005 年 9 月），頁 15。

29 池田精孝，〈醫學生が體驗した滿洲——滿洲国立佳木斯醫科大學〉，收入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4》（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6），頁 199。

川路村開拓團一度引發阿米巴痢疾(Amoebic dysentery)的流行，後來只剩 3、4 位年輕人繼續工作，部落幾乎慘遭滅絕。[30] 醫療環境欠佳，加以食物普遍不足、營養失調，死亡率自然迅速攀升。熊谷美都、岩崎都是因為不良的醫療環境，造成家人陸續逝去。[31]

遺華日僑口述回憶中，最大宗的敘事內容在於描寫戰爭結束之際各種無情的離別、緊張與恐懼，乃至死亡所帶來的感受。絕大部分主角都是女性，通過其經歷來凸顯這場「悲劇噩夢」。自太平洋戰事展開之際，各地開拓團的青壯男性先後被徵召入伍；徵集令係以男子 18 歲以上、45 歲以下為限。甚至直到宣告投降的前幾天，還有男子收到徵召令，卻連在何處集合、參加哪一支軍隊等細節都不曉得。[32] 1945 年上半葉，男性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者。婦女於是成為遺華日僑裏最重要的角色；她們不僅要操持家務、照顧老人和小孩，還得承擔全部的農活。

（二）與死神搏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一時之間

---

30 關島要三，〈開拓の夢を三たび追って——第八次老石房川路開拓團〉，收入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4》，頁 26。

31 熊谷みと，〈はるかなる祖国中国殘留五十年の半生〉，收入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1》（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3），頁 23-24；岩崎，〈憶親人的慘死〉，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42。

32 中山房治，〈中国の養父母に育てられて〉，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2》，頁 111。

豬羊變色。成為敗戰國家公民，首要問題是必須趕緊回到祖國。本來繁重的行李，此時被迫要一件件地放棄；而歷經長途跋涉的歸途，連親人也成為不得不拋掉的「選項」。水野百合子在投降後隔天收到開拓團的指令，必須趕往方正縣伊漢通碼頭，等待日本軍艦遣送回國。但是，目的地距離水野居住的依蘭縣將近一百多公里。為此她費盡氣力，跟著眾人隊伍朝方正縣邁進，但一面牽著女兒趕路，一面身上還得揹著年僅 2 歲的兒子，結果每日僅能走上 2、3 公里。由於擔心拖累大家的趕路計畫，水野聽到的建議竟是拋棄小孩：

> 團長說：「你扔了，中國人會撿去把他養大的；要帶上，影響大家趕路，上不了船，我們就都得死了。」……我一邊流著淚一邊對女兒說：「孩子，別怪媽媽無情啊，我這是給你留一條活路，要不咱就都得死了。」[33]

經過百般無奈，選擇扔棄是為了「留活路」，這是絕處裡所做的殘酷決定。羽賀君枝也提及：一路逃難經常看到有小孩被棄置於路旁，甚至還有母親佯裝要帶小孩喝水，領進河中順將小孩的頭按在水裏，乾脆活活溺死。另一個故事則發生在婆媳身上。由於婆婆體力不支，一直脫隊；兒媳婦擔心如果扔下婆婆的話，下場不是被狼吃了，就得被虎咬了，因此守在身旁。然而婆婆一想到祖國日本距離竟是如此遙遠，不知何時才能抵達，所以極力勸媳婦放棄自己這個累贅。就在隔天，婆婆趁媳婦不注意之際撞死自裁。[34]

---

33 水野百合子，〈我的恩與怨〉，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21。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34 羽賀君枝，〈逃難路上〉，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

1945 年的秋冬，令遺華日僑一生永難忘懷。這年 8 月中旬戰爭結束，逃難潮才剛起，寒冬緊接降臨。當人們性命交關之際，只能匆匆帶走細軟，誰還想到準備多餘物件？那些難民收容所或集結遣返日軍、日裔的村落，頓時湧進 3,000 至 4,000 名人口，光是住處便成為大問題。先來者可能還有機會住在屋內，後到的人根本擠不進去，只好隨意在路邊搭蓋地窯棲息；碰上寒冷氣候到來，自然難以抵抗。大浦孝子形容她所住的地方，是「陰暗寒冷，對面的人彼此鼻眼都看不清楚。屋裏沒有炕，人們就睡在水泥地上。剛來的時候，屋裏就涼颼颼的，一到冬天更是嘎巴嘎巴冷。窗戶用草團子塞著，四壁結了厚厚的冰霜。我們的行李、衣服在逃難的路上都丟掉了，到了冬天還穿著單衣服。」[35]

極度缺乏食物的情形下，老人、小孩成為最先犧牲的一群。他們飽受寒冬侵襲，紛紛感染傷寒、體力不支而亡。新京（今長春）的南大房收容所，據稱 6 歲以下小孩、60 歲以上老人無一倖免，難逃猝死命運。[36] 戰敗那年正擔任醫院助產護士的澤柳文美，親見 10 月期間到處有人挖穴掩埋小孩屍體。因為短短一個月內，氣候驟降造成逃難期間許多已經營養失調的小孩被凍死，不勝其數。[37]

前後》，頁 190-193。

35 大浦孝子，〈世代難忘活命恩〉，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69。

36 木下茂利，〈滿洲に新天地を求めて〉，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聞き書き報告集 2》，頁 180-181。

37 澤柳フミ，〈決斷　開拓地を出よう〉，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聞き書き報告集 2》，頁 74。

真正帶給活著人們壓力的，或許不在食物匱乏，反倒是面對死亡的恐懼。特別是大量死亡後，病菌隨之傳開，情形更加嚴重。戰後擔任松江省政府委員的田雨時，回想自己親赴哈爾濱附近的日人收容所，眼見男女披頭散髮，骨瘦如柴，情狀若瘋若癡，雖生猶死，慘不忍睹。據說原有 15,000 人，但多因凍餓、疾病喪生，最後僅餘數百人。田氏又前往所謂的「萬人坑」，裏面堆滿了凍死、餓死、被殺、自殺的千百具屍體。所幸當時天寒雪掩，尚少氣味，一旦氣候回溫，日後難免瘟疫流行。[38] 串原喜代枝形容難民收容所裏，先是小孩一個個地死亡，接著猶如爬梯子般，年過 50歲的人身體愈見脆弱，僅剩 2、30歲的青年人堪能負荷。每日清早起床，就會聽到「今日幾號房的某某已死了」，後來對於體驗死亡越來越沒有感受。[39] 許多回憶共同地指稱：因為收容所內太多人猝死，所以不知自己是和已死的人睡在一起，直到早晨起來才發現到處是已死、將死的人，深覺那種「消失」感無所不在。就連想要挖穴埋藏屍體，也不是一人一穴，而是乾

---

38 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大陸一角初陷自省錄（三）〉，《傳記文學》，卷 36 期 2（1980 年 2 月），頁 84。臺灣人到滿洲的翁通逢也有類似的經驗，某次見到來自北滿的日人，躲在日本小學裏，「經過三星期後我再去看，學校運動場像個墳墓」，心想夏天屍水流出，將發生流行傳染病，故決定離開。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翁通逢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116。

39 串原喜代枝，〈義勇軍の少年達とともに〉，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満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1》，頁 67。

脆挖處大洞，集體掩埋所有逝去的人。[40]

與死神的搏鬥，都沒有比集體自裁更駭人聽聞了。位在新京不遠處的河野村開拓團，是所謂示範的「皇國農村」。戰敗不久，該團決定移往吉林市避難。然而盡是婦孺的情況下，團民們深感歸國甚難，又怕無法保全節操，故決定集體自殺。她們先以平日勞動、防寒所穿的褲子將小孩勒死，然後一起上吊，總共 73 人，死狀慘烈。[41] 黑龍江省綏棱縣附近的開拓團，則由馬獸醫配製毒藥，發給每人一包，在團幹部監督之下全部服毒自殺。瑞穗地區則是幹部放火燒了團部；「有的婦女不忍心殺死自己的孩子，就偷偷地將自己的孩子放出去逃生，監督服藥的幾名男子有的最後也沒自殺，而是逃到山上躲了起來。」[42] 阿城縣的豐村開拓團最後也以爆炸來集體結束生命。[43]

三、浴火重生後的抉擇與命運

面對生離死別的痛楚，存留下來的日裔則選擇了繼續

---

40 小川津根子，《祖国よ——「中国残留婦人」の半世紀》（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 150。

41 久保田諫，〈集團自決をひとり生き殘って——第十三次河野村開拓團〉，收入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3》（飯田：飯田歷史研究所，2006），頁 27-28。

42 以上兩例均參見孫繼武、劉含發調查，劉含發整理，〈黑龍江省綏棱地區移民地調查〉，收入孫繼武、鄭敏主編，《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調查與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頁 189、192。

43 周福臣，〈日本豐村「開拓團」爆炸自決的前前後後〉，收入《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調查與研究》，頁 157-161。

「開拓」人生的方式。他們面對新的生命旅程，同時也在戰後的中國東北重新適應。值得留意之處，那時滿洲社會因應戰爭問題，性別關係也正歷經調整之中。這一節要簡單地從那些回憶的文字敘述中，分析關於他們在戰後的處境。

（一）過繼、再婚與提供勞動力

為了繼續生存，沒有任何謀生能力的日人只好選擇另一個「祖國」──紛紛充當中國家庭的媳婦或養子女。當時中國人何以願意對待無助的日本人，甚至樂於接受他們的小孩？如果單方面閱讀相關記載，可能陷入一種過度樂觀的思考。像是以中文撰作的憶述文字，絕大部分會呈現出所謂「對敵人寬大為懷」的精神，然而從社會需求的角度來看，真實情況未必如此。大體說來，東北地區在 1920 年代屬於男多於女的社會，原因是歷年由華北地區移入的人口，係以貧苦的男性獨身漢為主。[44] 直到滿洲國時期，戰爭帶來生活上的壓迫，使得東北當地的農村社會裏人口出生率極低，如果再加上長期普遍地營養不足、貧苦、衛生不佳等因素，可以想見成人的人口數並不多。[45] 此外，經濟困難也間接造成了締結

---

44 萬國賓，〈東北九省之地理與人口〉，《邊疆通訊》，卷 5 期 6-7 合刊（1948 年 7 月），頁 6。

45 以桓仁縣為例，1932 年人口數為 206,466，此後驟減。1936 年統計人口數為 137,942，1939 年後才又緩慢增加，至戰爭結束前一年 1944 年恢復至人口數 156,056。主要因素有二：一是日本屠殺無辜中國民眾；二是強制施行「集家歸屯」，導致無家可歸，疾病流行，死亡慘重。參見桓仁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桓仁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頁 762。

婚姻的阻礙，許多男性缺乏足夠的金錢而無法通婚、組織家庭。[46] 上述這些困難可能變成後來吸納遺華日僑的理由。

值得思索的是，收養遺華日僑還必須要考慮到國籍的法律層面問題。本來中華民國民法中有關於親屬身分互負扶養之義務，[47] 惟戰後滿洲政局情勢動盪不安，許多狀況恐怕無法按照常理來衡量。以中國名字張秀蘭的山田君子個案為例，14 歲的她被中國人收買，而入籍中國之際尚在中共建政以前。根據山田描述，國民黨主政時代，每晚都會派遣警察挨家挨戶來調查人口，所以為了避免節外生枝，她趕緊報入收買的家庭戶籍之中。此後，表面雖是中國人身分，可是究屬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始終一直困擾著山田。然而由於身分未明，直至山田 1989年打算回日本之際，卻發現自己早於 1952 年被以「戰時死亡」方式宣告除去國籍。儘管仍有過去的戶籍資料可供佐證，山田君子可以藉此申請歸化，但等待需長達五年，暫時只好以外國人身分登錄，成為無國籍的日裔僑民。[48]

---

46 這一點是曾經歷遣返的殘留日僑觀察及憶述。見上松久子，〈国共內戰に從軍した私の青春〉，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2》，頁 34。

47 楊立新主編，《中國百年民法典匯編》（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頁 508-510。

48 小川津根子，《祖国よ——「中国殘留婦人」の半世紀》，頁 216-219。山田君子在隔年 15 歲便已結婚，她的案例象徵入籍通常只是因勢利導之權宜措施，並且凸顯出幾項重點。首先，國籍與戶籍的二重身分符合，是戰前日本帝國確立國民的方式，可是這項辦法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遺華日僑。針對於此，日本政府還曾有多項措施安排，如 1959 年訂立的〈未歸還者特別措置法〉，其中包括了那些已被宣告死亡、塗銷戶籍的日本人，即使與中國人通婚也沒有喪失其日本國籍。

憑藉著父親敗戰前與當地農民的和睦相處，下山幸子與姐姐兩人在母親去世後，也成為中國家庭的養女。儘管領養的時間並沒有維持多久，下山姊妹便因遣返而歸國，不過她們卻得到良好照顧。[49] 另一例為 11 歲的中島茂，為了不想活活餓死，他到一戶何姓大家庭充當養子，並負責幫傭，在牧場裏畜牧長達八年。據中島回憶，還有比他年長的堂兄參加八路軍，甚至得到共產黨幹部的賞識。[50] 至於年僅 9 歲的戶島一行，則是被一位 24 歲的青年修鞋匠充當養子。由於生父有病在身，生母又無法照料全家，只好忍痛決定將戶島送給他人。本來戶島不願離開，但姐姐勸說「別白白犧牲性命」才聽話。[51] 上述幾位到了中國人家庭後，甚至都還取了中國姓名。

相較於年幼男女可過繼給中國家庭，延續香火，那些年齡接近成年或者已婚的婦女，大都選擇結婚甚至再婚一途。不過，其中仍有些微的差別，值得進一步推敲。譬如，在城

其次，1972 年中日兩國外交「正常化」後，厚生省開始進行中國遺華日僑調查，要求歸國者必須有親友家族對戶籍進行確認。不久民間團體便展開「就籍運動」，政府認定即使無親友的確認，但只要能夠確認國籍的話，亦可永住日本。上述討論均見：南誠，〈「中国帰国者」をめぐる包摂と排除 — 国籍と戸籍に注目して —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卷 83（2009 年 3 月），頁 121-137。

49 下山幸子，〈團長の娘として渡った私——第八次新立屯上久堅村開拓團〉，收入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5》（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7），頁 114-115。

50 中島茂，〈中国人になりきって暮らした開拓少年〉，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1》，頁 23-24。

51 戸島一行，〈尋親記〉，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200。

市和農村之間的境況即有不同。像城市裏，許多日本女性是嫁給中國軍隊的基層軍官，「她們多半願意自動以求一飽」；還有沿街叫賣、乃至成為女傭的人，他們往往都受過良好教育，程度很高。[52] 不過在農村之中，「當時跟中國人去的，大部分是利手利腳的婦女」，[53] 因為必須擔任平日農作。

此外在婚姻儀式上，農村生活一般較為貧窮，通常只能維持溫飽，所以過程相當簡單，並無繁文縟節，往往雙方達成生活的共識基礎後便結合。[54] 例如，小林真江、小林春江等 2 位日本女性，原本戰爭結束前已有家庭，但丈夫隨後接受軍隊徵召，下落不明；而小孩則分別都在逃亡期間罹難，所以當中國男子前來要求共組家庭時，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了。[55] 慶遠屯部落在日本投降以後，中國人發現被開拓團遺棄的 8、9 歲小女孩工藤日佐子，原本打算殺她以吐怨氣，後經人勸說而放生。此女孩後來輾轉到古蹟鄉保安屯，農民

52 趙世洵，〈東北見聞錄（四）〉，《大成》，期 40（1977 年 3 月），頁 50；沈雲龍、陳存恭訪問，陳存恭紀錄，《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 111-112；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翁通逢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15。

53 大浦孝子，〈世代難忘活命恩〉，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69。

54 熊谷みと因為接受張家收養，歷經數年後居滿 17 歲，以生活貧乏窮苦為由，嫁給張家兒子。但是，這樣的婚姻連照片也沒有，遂使日後歸返日本時都無從證明。類似像她這樣的個案並不少。熊谷みと，〈はるかなる祖国中国残留五十年の半生〉，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聞き書き報告集 1》，頁 46。

55 小林真江，〈破鏡難圓〉，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212-213。

劉臣義在田野見到她，深覺可憐便帶回家。爾後劉母對女孩特別喜歡，決定收留。工藤長大後，自願與劉氏弟弟結為夫婦，並育有兒女。[56] 水野百合子則是在方正縣收容所裏，面對饑寒交迫、傳染病到處散布、眼看即將死去之際，一位年約 30 歲的青年李春林前來，表示願意帶她回家。根據水野日後描述，收容所內其他難民「都用羨慕的眼光望著我」。然而，她並非來到了一處衣食無憂的環境，因為李家連炕席也沒有，還是向親戚借錢來訂製水野的衣服。後來經過李氏母親日夜照料，終使水野病情好轉；又因兩人相處和諧，水野主動提出結婚，生有一男一女。[57]

選擇結婚作為重生之途，相信是滯留滿洲、等待遣返的日本女性，唯一不得不採行的辦法。有些例子，日本女性投靠了原來比較信任的雇工，尤其以單身者作為婚姻對象，當然亦有帶著子女全家來依附者。[58] 根據平柳今沙代的口述，她原本是一家五口到滿洲「開拓」，結果小孩先後死亡，接著丈夫奉召當兵。戰爭結束時業已 36歲的平柳，身邊還帶有一名年甫 6 歲的兒子；面對孤兒寡母的窘境，他們只好尋求

56 黃耀慧調查整理，〈內蒙古科右前旗日本移民地調查資料〉，《東北淪陷史研究》，期 4 (2001)，頁 63、69。

57 水野百合子，〈我的恩與怨〉，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22-123。

58 北澤輝子回憶到自己同一開拓團的人，「大家無處可去，紛紛投靠了原來在我們各家當雇工的中國人，這樣一家人也就有了著落。有的青年婦女嫁給了原來自己家的雇工，現在中和鎮街里的岳元珍和中和勝利村的趙方，就是娶的自己曾給幹過活的日本人家的媳婦。我姨也嫁給了一個中國人，我們姊弟五人開始就在他家生活。」北澤輝子，〈痛苦的回憶〉，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66。

「唯一的活路」──嫁給未婚男子侯瑞清。[59] 與平柳今沙代的境況有些不同，本野時興是在父親勸說下，嫁給了年長於她將近 14 歲的張文簡。儘管張氏家裏很窮，但平日生活對本野極好，並不要求她下地種田，只須幫忙處理家務即可。此外，張氏還經常照顧本野一家生活，甚至送飯菜給她娘家。[60] 還有一處例證，則顯得相當無奈。1946 年，18 歲的村田初江與中國人劉萬福結婚。由於村田始終企盼有朝一日得以返歸日本，雖是心中百般不願，但眼見母親下嫁他人，也只好順從命運安排，委身一位自己其實並不喜歡的男性。[61]

（二）中介者的角色

遺華日僑的憶述之中，男性選擇的道路及其命運則有不同。前述婚姻在經濟困難的條件下，造成許多中國人無法組織家庭，大量吸納年幼兒童以傳承香火。至於那些年紀太大、不適合以養子身分投寄他人者，則是充當雇工，負責勞務工作，以求溫飽。例如，戰後屆齡 16 歲的宮澤一三就是明顯例證。他先是倚靠一位王姓的中國人，主要擔任長工的工作。直到 1953 年，宮澤才與一位中國家庭的日本養女結婚。或許由於年齡較長的關係，為宮澤一三帶來與眾不同的

59 平柳今沙代，〈活路〉，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60-161。

60 本野時興，〈移民恨事〉，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10。

61 村田初江，〈日本に歸化した日本人〉，收入 NPO 法人中国殘留日僑の會編，《わたしたちは歴史の中に生きている：「中国殘留邦人」と家族　10 の物語》（東京：編者印行，2011），頁 44-45。

「認同」；他後來在回憶文章中，甚至強調自己還不忘日語，而這樣的感受也使得自己適應有困難，中文的學習也未必能夠全部瞭解。[62]

這些依附當地中國家庭的歷程裡，不能忽略中介者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回憶之中，不時可以看到有些居間牽線的人口販子，幫忙進行勸說；他們有的是中國人，絕大部分則是日本難民本身。中山房治的回憶提到：最初有位張姓男子，為人和善，笑嘻嘻前來問候，令他與妹妹深感不安。母親特別告誡「絕對別去中國人的家庭！」。[63] 憶述內容中提到的張姓男子，應該與人口仲介有關。山木瀨子則在父母雙亡後、祖母與哥哥致力想辦法尋求生存之際，經由表姐的介紹，被一戶陳姓家庭收留為養女。當時陳家共有五口人，以種地為生，生活的條件並不算佳。就在幾年後，由於鄉鄰的撮合，山木便決定與養母的大兒子結婚。[64] 當初負責介紹山木的表姐，極有可能扮演中介的功能，目的是為了讓山木家人放心。

現今並不需要去苛責這些中介販賣人口的行徑，因為那可能是努力創造「三贏」（中國家庭、被收養者、未被收養者）局面最佳的辦法。鈴木五三美之所以被人收養，乃是經

62 宮澤一三，〈在滿二十二年　日本語を忘れず——第八次大八浪泰阜村開拓團〉，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4》，頁 63-67、72。

63 中山房治，〈中国の養父母に育てられて〉，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2》，頁 122-123。

64 山木瀨子，〈一個日本孤兒的自述〉，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15-116。

由一位日本老太太居中介紹的緣故。根據鈴木後來所描述，中國老農民是從「兜裏掏出 50 元錢遞給日本老太太，日本老太太把錢分給了沒走的人」，[65] 顯然這位負責牽線的日本年長女性，考量是要讓收容所的難民都能獲得安養。大浦孝子也特別提到一位姓世本的老婦人，建議母親把她賣給別人，目的是得到充足的糧食及金錢，挽救正在生病的哥哥。就在大浦同意成全之下，隔天世本便帶領一位張姓男子，以大米和 30 元的代價將大浦認作妹妹。[66] 甚至從類似的回憶可以看到，直到戰後五、六年期間，東北當地販賣人口的情況依然持續發生之中。北澤輝子是在 1946 年蘇軍撤走以後，以 200 元蘇聯紅票的價錢被賣到地主老朱家，成為僱傭。[67] 還有另一種特別的情況則是：某甲與某乙分別買了同一家人，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決定讓該家小孩同住在一起，於是某甲便支付了某乙購買時的費用。[68] 考量中介角色之際，經濟因素固然極為要緊，但也不該忽略當中屬於人性的一面。

四、性別與歸國心態

---

[65] 鈴木五三美，〈到中國家庭的前前後後〉，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33-134。

[66] 大浦孝子，〈世代難忘活命恩〉，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70-171。

[67] 北澤輝子，〈痛苦的回憶〉，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66。

[68] 例如中山房治與妹妹的情況便是如此。中山房治，〈中国の養父母に育てられて〉，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2》，頁 129。

其實釐清遣返話語性質最終之目的，在於瞭解遺華日僑對未來的期待與動態。這些口述文字呈現了他們對現狀之關懷，也凸顯身處社會邊緣人的心態。更重要是，同時還反映了 1970 年代中、日兩國的外交情形。

（一）另一種「他者」

等待遣返日本的國民，大部分等同放棄了戰前自己在海外的資產。當他們回到戰後亟待復興的日本社會，面對社會資源和人際關係的困乏，相當不易就業。據尾高煌之助的探究，歸返回國日裔的主要就業傾向，依序為農業、製造業、零售業、服務業、運輸業和公務員；其中，從事農業的人數占絕大比例。[69] 揆其原因，一方面由於百廢待舉，都市不可能容納過多的就業人口及市場；另一方面若從滿洲遣返日裔本身來看，他們擁有的農耕經驗，自然以經營相關的工作最為便利。可以看到，不少遺華日僑有回國「再開拓」的經歷。戰爭結束前曾被徵兵的關島要三，1946 年回日本後在山梨縣經營農事。隔年，妻子也順利回國，在與其他有「滿洲經驗」的朋友互勉下，關島決定眾人一起到北海道，從事農耕工作。[70]

然而，關島要三之例其實是比較幸運的；歷經戰爭顛沛

---

69 這裡主要引用的是 1950 年日本國勢調查報告。參見尾高煌之助，〈引揚者と戰爭直後の勞働力〉，《社會科學研究》，卷 48 號 1（1996 年 7 月），頁 139-140。

70 關島要三，〈開拓の夢を三たび追って——第八次老石房川路開拓團〉，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4》，頁 45-48。

流離的遺華日僑，當回到祖國後，農業以外的工作似乎並無想像地那麼順遂。本來擔任鐵嶺陸軍醫院衛生兵的森本勝治，因為個人身負特殊技能，在日本投降時反而被中共軍隊留用，直迨 1953 年才遣返歸國。但結果適逢經濟不景氣，無法人盡其才，三年半之中一直只能倚靠兄長救濟。[71] 甚至另一位女性遺華日僑橋場定美還私心認為：跟戰後返歸時發生糧食極端不足的情況相比，戰爭結束前的滿洲生活彷彿就像是活在天堂一般。[72]

敗戰前的徵兵活動，無疑活生生地拆散了這些遺華日僑的家庭，甚至有的人直到戰後並未團圓。那些被徵召從軍的日本男性，最初絕大多數返抵國門之際，依然企盼能夠見到家人，但後來音訊仍無。以前往滿洲者為例，有人因為妻兒雙亡，只好另組家庭。像筒井茂實，1945 年 7 月被徵召到新京參戰，不久後確知戰敗，隨即又傳來妻子自殺消息。遭到一連串打擊的筒井返回日本，本想領養小孩度過餘生，卻有幸結識了第二任妻子美惠子。美惠子其實也是再婚，她雖無「開拓」經歷，但前夫曾赴滿洲，後因徵兵戰死。[73] 還有些人熱切候望妻兒能早日返國，可是消息始終杳然，故決定再婚，結果社會問題因此叢生，一時之間重覆申請辦理結婚登

---

71 森本勝治，〈八路軍に留用されて——第一次長嶺義勇隊開拓團〉，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3》，頁 214。

72 橋場定美，〈土地を求めて——第八次大古洞下伊那鄉開拓團と神原村峠山開拓團〉，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3》，頁 228。

73 筒井茂實，〈ハルピン開拓指導員訓練所で蔬菜作り研究して〉，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2》，頁 159。

記者甚多。奧山龜次郎徵兵入伍不久，與蘇軍作戰被俘，押往蘇聯西伯利亞地區修築鐵路，歷時兩年勞役才回國。之後，他苦等了六、七年，多方打聽仍未見妻子小林真江的音訊，於是再婚。結果日後輾轉得悉前妻尚在人間，只好通信要求填具退婚書，云若不如此，則新任妻子、孩子將無從辦理入戶登記。[74]

此外語言的問題，同樣使得遺華日僑回國後彷彿成為另一「他者」而存在。不可諱言地，許多遺華日僑固然受到語言限制，無法順利返回「原鄉」；但歸國者勢必將面臨生活適應上更大的挑戰。山田陽子訪問並檢討這群人身處日本社會的生存情況，發現儘管政府設有類似輔導、補救的制度(如身元引受人、自立指導員等)，[75] 協助他們處理日常生活中的難題，卻仍不能擺脫困境。譬如，因為他們在日語的溝通上發生障礙，往往只能選擇在那些收入低、工時長的勞動環境工作。以製造業來說，遺華日僑幾乎都在具有操作、使用機械的公司裡上班；薪資方面則是受限於日語能力的緣故，往往也較其他同業的人要少得多，乃至無端還被資方解僱。於是學習日語成為遺華日僑歸國後重要的活動，也是他們希望能夠獲取職場雇用的機會，甚至是遭受欺凌時足以對抗的武器。[76] 因應社會不平等的待遇，遺華日僑形成「他者」認

74 小林真江，〈破鏡難圓〉，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213。

75 山田陽子，〈「中国帰国者」と身元引受人制度 — 中国残留孤児の日本への帰国をめぐって — 〉，《人間文化研究》，卷 8（2007 年 12 月），頁 99-111。

76 山田陽子，〈中国帰国者の日本語習得と雇用 — 国家賠償請求訴訟

同，具有千絲萬縷的複雜情感。

至於滯留滿洲的日裔，大多面臨改嫁或孤兒（包括被拋棄的子女）被收養之情形。他們在 1953 年時，經由聯合國及國際紅十字會協助下，中、日兩國達成協議，由各地公安局外僑科負責辦理手續，申請歸國事宜。不過，卻有人在戰後諸多條件發生變化下，思考日後出路問題。以下分別從相關口述記載探析他們的理由與處境。

（二）性別帶來不同的遭遇及心境

首先是關於年幼遺華日僑的長大與論及婚嫁。許多憶述文字指稱：中國適婚年齡通常較早，尤其女性大部分在 20 歲以前。被收養的女性面對此一問題，不禁思考究竟是要結婚入中國籍，還是要等待機會返回日本？如中山房治的妹妹，當時便碰到類似情況。當養父母向中山提及婚事，中山還企盼得悉能否歸返日本的問題。嗣後他與妹妹商量後，妹妹說：「還是聽從養父母的話吧」，於是決定與安排的男子結婚。[77] 原為日本遺孤的劉秀清也觸及同樣問題，所幸她的養母和先生對此並無刻意要求，沒有帶給她太大的困擾。[78]

至於被收為養子的日本男性孤兒，反而少有難以適應之處。從有限的紀錄來看，他們另有一番特殊經歷。由於身為

における歸国者の陳述および身元引受人の語りから—〉，《人間文化研究》，卷 5（2006 年 6 月），頁 83-100。

77 中山房治，〈中国の養父母に育てられて〉，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2》，頁 130。

78 岩本くにを，〈妹との別れと再會と——第八次大八浪泰阜村開拓團〉，收入《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5》，頁 258。

日本人，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被認為是特務，慘遭批鬥，甚至連要結婚的對象也不信任。吉田英行的例子頗為傳奇，很適合作為觀察的個案。他在 8 歲的時候被中國人領養，改名為蘆永德。讀書求學期間，曾與同校一位日本女孩相戀，惟未得到養父認可，怕「娶個日本姑娘將來拐回日本」，於是 16 歲時託人另外介紹而結婚。[79] 婚後，吉田在建設公司充當工人，由於工作表現良好，得到領導賞識，黨組織吸收為預備黨員。1962 年，另一位遺華日僑打算辦理歸國手續，夥同吉田一起商量。這件事無意間被妻子發現，並向法院檢舉，使得「一貫保密的蘆永德是日本人的秘密卻公開了」。結果，黨組織以「對黨不忠實」為由，取消了吉田預備黨員的資格，同時也在工作上認定「不宜用日本人」，而被調任為一般雜勤工作。由於妻子的告密，促使吉田的家庭關係惡化，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適逢文化大革命初起，吉田英行為了要擺脫這種處境，決定自動報名去貴州支邊。[80] 同樣有著類似遭遇的日本孤兒胡菊芳，文革時 25 歲，不懂日語的他亦被認為是日本特務。為此胡菊芳被關進牛棚，鎮日掛著大牌子，不停地遭人批鬥，身心俱受重創，留下陰影。終於在 1986 年，胡獲得「中國歸國者支援會」幫忙，取得日本國籍，重新展開人生。[81]

---

79 吉田英行，〈在中國親人中間〉，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216-217。

80 吉田英行，〈在中國親人中間〉，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217-218。

81 胡菊芳的個案引自口述調查，參見關亞新、張志坤，《日本遺孤調查研究》，頁 549。

其次為返回日本後定居問題，也在性別上產生不同的效應。許多女性遺孤結婚生子後，儘管日本親人規勸留居，但畢竟已有新家庭，難以全然脫離，最後仍選擇留居中國。如被中國家庭領養的佐藤青子，以「根已紮在中國」為由，婉拒日本哥哥的要求。[82] 鈴木五三美的情況也是一處代表例證。1950 年，她收到生母遠從日本寄來的信，規勸她趕緊辦理歸國手續。但已經結婚的鈴木，由於當時中日兩國尚無外交關係，且丈夫、小孩無法一齊帶去，只好覆信將在適當時機歸返日本。1966 年，身為五個孩子母親的鈴木，再度收到生母郵寄的兩萬日元及回國手續單，帶著小女兒回到日本。歷經六個月的團聚後，生父執意要鈴木留下，生母卻深悉女兒心意，向父親說：「咱們惦記她一個，不能叫她惦記五個」，於是讓鈴木返回中國。後來幾次的中國、日本往返，鈴木五三美始終都沒有在日本定居下來。[83]

這些抉擇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遺華日僑中女性對「家」與「國」的認同之別。戰爭期間本來已有婚姻和小孩的松田千衛，歷經戰後一連串的不幸變成孑然一身，之後又與中國男性締結婚姻、組織新家庭並育有一子。在 1952 年歸返風潮裏，松田的內心深感矛盾，不知究竟該如何？她的中國丈夫則是同意松田自己回去，可是「一定要把孩子給我留下」。

---

[82] 梁玉多、楊玉林、辛培林，〈寧安市鏡泊湖日本移民侵略活動調查散記〉，收入《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調查與研究》，頁 51-52。

[83] 鈴木五三美，〈到中國家庭的前前後後〉，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40-141。據我所知，鈴木個人近幾年業已返回日本定居，目前正由日本「滿洲的記憶」研究會重新進行口述訪問之中，預料將與《文史資料》的敘述有所出入。

幾番掙扎後，松田千衛終於體認到「扔下孩子一個人回到日本是不會幸福的」，不如等到孩子長大再回去。[84] 在凸顯「家」的重要性上，松田的個案是將目前個人的幸福緊緊地維繫住，遠比長久日本的認同要來得迫切重要，因而取代祖國之意義。

必須指出，這些留在中國女性遺孤的文字，因為多半經由口述方式，登載於《文史資料》一類的刊物上，所以內容上不無強調另一「祖國」—中國的情懷，透過「第二故鄉」來訴諸愛國意識。西川候子傳達自己「從開拓民到中國公民」的經歷，也不忘提到：「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已經生活了十幾年，這裏也有我的孩子，我的親骨肉啊！他們也需要母親。……孩子是 中國人的骨血，我能忍心把他們帶到日本？」[85] 水野百合子則係以「人道」為由，婉拒日本親友、前夫希望她留下的請求：

> ……我中國的婆婆，是她們母子把我從死神的手裏奪了回來，是她使我懂得了很多人生道理，是她幫我拉扯大了兩個孩子。我不能忘了她，也不能沒有她，我有責任給她養老送終。我就是死了，也要讓我的孩子們，代我報答中國人民對我的恩情。……我沒有在日本久留，很快就返回了我依戀的第二故鄉——中國。[86]

---

[84] 松田千衛，〈惡夢醒來〉，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58-62。

[85] 西川候子，〈從一個開拓民到中國公民〉，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53-154。

[86] 水野百合子，〈我的恩與怨〉，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24。

這些「溫情」的內容，彷彿也訴說自己歷經「再造」。山木瀨子則在 1975 年 10 月，帶著 2 個孩子到日本訪親，半年後如期返回中國。她在口述訪談的結語是這麼說：

> 在日本時，那裏的親友曾勸我留下，因為那裏的生活水平比中國高得多，但是我能那樣做嗎？是中國人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在中國，有我的愛人，有我的親生骨肉；單位裏的同事們，待我也都情同姐妹，我的根已經紮在這裏了。你們看，我現在生活得多幸福啊！[87]

無獨有偶，小林真江也在 1975 年返回日本探親。回到中國後，她經常收到前夫來信問候。但面對中國尚有兒孫孝順，而且有工人退休待遇，小林深感自己晚年是幸福的，決定留在這個擁有「第二生命」的中國。[88] 這是否為當事人之初衷，或者事後對官方的「交代」，因為缺乏足夠論證，尚待觀察；可是當吾人在閱讀這些相關記載時，不妨留心其中的意涵。

耐人尋味地，男性遺華日僑依照年齡差別，表現結果亦大相逕庭。年長者多數傾向返回日本定居，態度上也沒有女性口中兩個「祖國」、「故鄉」的包袱。譬如，松野隆信在 7 歲時跟著全家到黑龍江慶豐村進行「開拓」，不到兩年日本戰敗，各地戰亂頻仍，為求自保，決定給王姓人家充當養子。直到 1950 年代，松野入籍中國，又娶妻生子。直至中

---

87 山木瀨子，〈一個日本孤兒的自述〉，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117。

88 小林真江，〈破鏡難圓〉，收入《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頁 214。

共與日本邦交建立後，他得以返國探親，家中親屬勸其落葉歸根。幾番衡量後，松野辦理定居手續。[89] 至於年幼者，則是有放棄返歸日本權利之例。像一位始終沒有講明自己日本姓名的男子，卻以相當強烈的口吻，說出不願歸國定居的理由：

> 說心裏話，我很佩服他們那高度的物質文明，但生活習慣等各方面，我總覺著和他們格格不入。尤其使我自尊心大受挫傷的，是我的親屬們注視我時，那種掩飾不住的憐憫加歧視的眼光。好像在中國大陸就像在地獄中受苦似的，他們以救世主自居的神態，實在叫我受不了。出於禮貌，我沒有對來看望我的親屬反唇相譏；我卻斷然拒絕了他們多次請求我先放棄中國國籍，再申請加入日本國籍，然後再去日本定居的請求。[90]

他是在 1986-1987 年間先後 2 次到日本。二戰結束之際，這位男子大概只是一位年僅 4 歲的小孩，許多記憶對他來說或許相當模糊。從類似例子可以發現，對土地的認同想必要遠比「國家」來得強烈；而其感受則印證了前述華樂瑞所論「他者」的寫照，也可視為處於兩國社會邊緣人的心態。

結　論

[89] 梁玉多、楊玉林、辛培林，〈寧安市鏡泊湖日本移民侵略活動調查散記〉，收入《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調查與研究》，頁 50-51。

[90] 陳仁財口述，金小瑞整理，〈東瀛風光好不如黑土親〉，收入《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調查與研究》，頁 185。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戰爭一旦開始，勝負的哪一方民眾，都必須承受殺戮帶來 的 離散與傷亡之痛。二次大戰期間，除了物資配合軍事戰略產生地域性流動外，人口移動也是值得注目的課題之 一。無論這些移民是否出於真心自願，抑或受到外力影響，實際上他們付出的代價，並未隨著戰爭結束而獲得充分解決。有些歷史見證者甚至還成為日後國際外交的爭議所在。

本文所探討的對象 ──遺華日僑在戰後的處境便係如此。由於外交現實的利害關係，他們獲得一定程度之關注，並且引發社會上諸多討論。通過曾經參與「開拓」日人的「滿洲經驗」，這篇短文論旨如下：戰爭期間到滿洲 參與「開拓」的日本人，不過是試驗性質濃厚的「國策」下之「被害者」。[91] 儘管很多日人配合帝國向外擴張而移民，但細究動機，不諱言因為現實生活壓力所致，只好遠離家鄉，前往白山黑水開闢夢想。然而，前往「新天地」毋寧是條充滿荊棘的道路。從遺華日僑的憶述裏可知，舊俗、氣候、衛生以及疾病，都是亟待克服的障礙；隨著戰爭結束，這些壓力並未因此消除，隨著亡國喪權的痛楚接踵而來，敗戰日裔面臨孤苦無依的狀態，成為國際「棄兒」。蘇聯軍隊的暴行、天候及病菌侵襲、集體自裁與死亡恐懼陸續上演，留下遺華日僑的慘痛回憶。

從口述史料之中，我們歸納了遺華日僑的各種抉擇。值得提出的是，這些選擇也因為性別差異而有不同的結果。另

---

91 這一點反省，也有少數的研究提出。今井良一，〈戰時下における「滿洲」分村開拓團の經營および生活實態〉，《村落社會研究》，卷 12 號 1，頁 21。

外，雖然有許多人企盼歸返國門，可是無力回到日本的僑民，則是極力就地尋求謀生之路。除了少數因為特殊理由而寧可留在中國者外，[92] 命運迫使他們成為一群身分認同混淆的人。尤其冷戰時期，歷經飄蕩的遺華日僑遭到現實環境左右；文革時被斥為「戰爭餘孽」，中日兩國恢復正常外交後，則搖身變成政治棋子。無情地打壓、熱情地湧現，令其無所適從，更加深了社會邊緣感。當他們被視為「他者」來對待，而在中國又有難以揮去的陰影之際；擺在面前的，是一段無法忘懷的遣返話語，還有不為人所知的過去。

探究遺華日僑遣返記憶的內容，固可增添不少歷史具象，填補以往不被重視的部分，惟並非毫無缺憾之處。雖然已有學者關注這些回憶本身的真確性，甚至留心口述資料本身的特徵，[93] 但難免會掛一漏萬，只選擇或刻意地來記錄自己。儘管戰亂之際，這些遺華日僑面對不可預知的將來，使

---

92 日本敗戰後，同盟國聯軍(GHQ)對日進行託管占領，實際情形不見得要比中國發生內戰為佳。所以，很多日僑固然企盼遣返，但深知未必為最好的脫困辦法。譬如有許多技術人員，他們對於一下子被遣送回國，反而感到前途茫茫；甚至直到 1949 年中共建政的前夕，仍有留在大連的原來滿鐵中央試驗所相關人員。例證可見沈雲龍、陳存恭訪問，陳存恭紀錄，《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頁 100；杉田望，《満鐵中央試驗所——大陸に夢を賭けた男たち》（東京：講談社，1990），頁 240-245。相關研究如大澤武司，〈戰後東アジア地域秩序の再編と中国残留日本人ノ發生——「送還」と「留用」のはざまで〉，《中央大學政策文化總合研究所年報》，號 10 (2006)，頁 35-51；鹿錫俊，〈戰後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留用」問題：この研究の背景と意義を中心に〉，《大東アジア學論集》，號 6（2006 年 3 月），頁 183-188。

93 雖然蘭信三曾注意到中國殘留日本婦人的經驗，並簡略區分有七種特徵，但未關注到男性居中扮演的角色。蘭信三，《「滿洲移民」の歷史社會學》，頁 260-266。

得他們有了這樣或那樣的抉擇；傾聽這群人對過去離散的回憶與心聲，或許正是今日吾人如何省思避免戰爭、追求和平的切入點。

徵引書目

一、史料

〈NHK2 作品がグランプリに　モナコの国際テレビ番組コンクール〉，《朝日新聞》，1996 年 2 月 22 日，第 12 頁。

NPO 法人中国殘留日僑の會編，《わたしたちは歴史の中に生きている：「中国殘留邦人」と家族　10 の物語》。東京：編者印行，2011。

NPO 法人中国歸国者の會編，《中国殘留邦人等国家賠償求訴訟》。東京：編者印行，2006。

アジ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編，《史料　滿鐵と滿洲事變──山崎元幹文書》，上冊。東京：岩波書店，2011。

小川津根子，《祖国よ──「中国殘留婦人」の半世紀》，東京：岩波書店，1995。

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大陸一角初陷自省錄(三)〉，《傳記文學》，卷 36 期 2，1980 年 2 月，頁 80-86。

矢內原忠雄，《滿洲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34。

沈雲龍、陳存恭訪問，陳存恭紀錄，《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政協黑龍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政協方正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夢碎「滿洲」──日本開拓團覆滅前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孫繼武、鄭敏主編，《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的調查與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黃耀慧調查整理，〈內蒙古科右前旗日本移民地調查資料〉，《東北淪陷史研究》，期 4，2001，頁 60-71。
楊立新主編，《中國百年民法典匯編》。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萬國賓，〈東北九省之地理與人口〉，《邊疆通訊》，卷 5 期 6-7 合刊，1948 年 7 月，頁 1-6。
滿洲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滿洲國史·總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
滿洲移民史研究會編，《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滿洲移民》。東京：龍溪書舍，1976。
滿洲開拓史復刊委員會編，《滿洲開拓史》。東京：全國拓友協議會，1980。
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1》。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3。
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2》。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6。
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3》。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6。
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4》。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6。
滿蒙開拓を語りつぐ會編，《下伊那のなかの滿洲　聞き書き報告集 5》。飯田：飯田市歷史研究所，2007。
趙世洵，〈東北見聞錄（四）〉，《大成》，期 40，1977 年 3 月，頁 44-50。

橘樸，〈時評·滿州移民の經濟價值〉，《滿州評論》，卷 6 號 23，1934 年 6 月，頁 4-6。

二、專著

小林英夫，《「滿洲」の歴史》。東京：講談社，2008。

山崎豐子著，王文萱譯，《作家的使命　我的戰後》。臺北：天下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2。

井出孫六，《終わりなき旅：「中国殘留孤兒」の歴史と現在》。東京：岩波書店，1991。

皮耶·諾拉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I》。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杉田望，《滿鐵中央試驗所──大陸に夢を賭けた男たち》。東京：講談社，1990。

坂部晶子，《「滿洲」經驗の社會學：植民地の記憶のかたち》。京都：世界思想社，2008。

桓仁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桓仁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張志坤、關亞新，《葫蘆島日僑遣返的調查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張嵐，《「中国殘留孤兒」の社會學：日本と中国を生きる三世代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東京：青弓社，2011。

貴志俊彥、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世紀滿洲歴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

增田弘編著，《大日本帝国の崩壞と引揚·復員》。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2。

關亞新、張志坤，《日本遺孤調查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蘭信三，《「滿洲移民」の歷史社會學》。京都：行路社，1994。

Tamanoi, Mariko Asano. *Memory Maps: The State and Manchuria in Post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Watt, Lori.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Wilson, Sandra.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33*. London: Routledge, 2002.

三、論文

上田貴子，〈文史資料についての覺書〉，《近現代東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會ニューズレター》,號 12 ,2003 年 12 月 ,頁 14-17。

大澤武司，〈戰後東アジア地域秩序の再編と中国殘留日本人ノ發生──「送還」と「留用」のはざまで〉，《中央大學政策文化總合研究所年報》，號 10，2006，頁 35-51。

小島雄輔，〈中国殘留者發生の經緯と背景〉，《政治學研究論集》，號 21，2004，頁 273-293。

山田陽子，〈「中国歸国者」と身元引受人制度 – 中国殘留孤兒の日本への歸国をめぐって – 〉，《人間文化研究》，卷 8，2007 年 12 月，頁 99-111。

山田陽子，〈中国歸国子女と家族への日本語教育：1970 年代に開始した村〉，《人間文化研究》，號 9，2008 年 6 月，頁 141-153。

山田陽子，〈中国歸国者の日本語習得と雇用 – 国家賠償請求訴

訟における歸国者の陳述および身元引受人の語りから－〉，《人間文化研究》，卷 5，2006 年 6 月，頁 83-100。
今井良一，〈戰時下における「滿洲」分村開拓團の經營および生活實態──長野縣泰阜分村第八次大八浪開拓團を事例として〉，《村落社會研究》，卷 12 號 1，2005 年 9 月，頁 11-22。
孔經緯，〈1931 至 1945 年間日本帝國主義移民我國東北的侵略活動〉，《歷史研究》，期 3，1961，頁 97-107。
石濱昌宏、田所竹彥、景慧、伊藤一彥，〈ドラマ「大地の子」を検証する〉，《宇都宮大學国際學部研究論集》，號 6，1998 年 6 月，頁 183-198。
成田龍一，〈「引揚げ」に關する序章〉，《思想》，號 955，2003 年 11 月，頁 149-174。
吳文星，〈戰後初年在臺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33，2005 年 6 月，頁 269-285。
尾高煌之助，〈引揚者と戰爭直後の勞働力〉，《社會科學研究》，卷 48 號 1，1996 年 7 月，頁 135-144。
南誠，〈「中国歸国者」をめぐる包攝と排除 － 国籍と戶籍に注目して －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查報告》，卷 83，2009 年 3 月，頁 121-137。
宮田幸枝，〈「中国殘留婦人」問題と教育實踐：識字實踐を中心に〉，《人文學報·教育學》，號 30，1995 年 3 月，頁 205-223。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卷 11 期 2，2004 年 12 月，頁 1-75。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3，2012 年 9 月，頁 95-150。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文史精華》，期 2，2009，頁 13-21。

鹿錫俊，〈戰後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留用」問題：この研究の背景と意義を中心に〉，《大東アジア學論集》，號 6，2006 年 3 月，頁 183-188。

曾齡儀，〈評華樂瑞《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引揚與重整》〉，《臺灣史研究》，卷 19 期 3，2012 年 9 月，頁 237-244。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期 3，2003 年 9 月，頁 201-227。

Tamanoi, Mariko Asano. "Review: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by Lori Wat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9:4, November 2010, pp. 1256-1258.

Wilson, Sandra. "The New Paradise: Japanese Emigration to Manchuria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7:2 May 1995, pp. 249-286.

四、網路資料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B0%E3%81%AE%E5%AD%90（2014 年 3 月 28 日檢索）。

Marginal People of Two Motherlands: The "Abandoned Japanese" and War, Memory, and Gender

Chih-hung Lin*

Abstract

The term "abandoned Japanese" refers to those Japanese left in China for various reasons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Most lived in Manchuria, and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y experienced life and death situations and many changed their identities to become Chinese. In the 1970s, when Japan and the China restored diplomatic relations, some of the "abandoned Japanese" reclaimed their original identities and returned to Japan, becoming marginal people of "two motherlands."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ntity of "abandoned Japa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ar, memory, and gender.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war memory itself. The "abandoned Japanese" not only became a pawn in the Cold War era of diplomatic "war" but also their "Manchurian experience" became a site of the search for war responsibility.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ir memories of a variety of experiences, including the frustration they felt at the bottom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f society, as well as the terror of the "Manchurian experience" as they faced life and death situation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Finally, gender differenc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ir choices about their future plans. It is clear that "abandoned Japanese" as marginal people produced by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reflect the tragedy of war and possess complex identities.

Key Words: "abandoned Japanese," Manchurian experience, repatriation, oral history, identity